

#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 关税约束承诺与出口稳定性

□ 周定根 杨晶晶 赖明勇

湖南大学 经济与贸易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79

企业出口所面临的不确定性主要来自目的国的市场需求、地理距离、文化传统、法制制度和政策环境所导致的信息不对称,其特点是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持续存在,成为重要的贸易壁垒(Osnago等,2015)。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使企业推迟或取消进入新的国际市场、减少对出口市场的投资、对关税下降的响应不足(Handley,2014)。为了克服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出口造成的负面影响,企业可选择有序地出口和向有出口经验的临近企业学习如何应对不确定性,或者通过地域多元化和试营业来分散风险(Albornoz等,2012)。政府之间缔结贸易协定可以创造良好的贸易环境,WTO的关税约束承诺也明显降低了成员国贸易政策逆转的风险。

## 一、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影响 出口稳定性的作用机制

加入WTO后,中国所面临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同时,中国政府也做出一系列开放市场的承诺,致力于创造一个市场化的经济环境,以促进贸易和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其中体现得最明显的是进口关税大幅下降。Brandt等(2012)发现中国在加入WTO后,早年较高且分化的关税税率收敛到较低且均匀的水平。采用UNCTAD和WTO的关税数据计算后发现,2001—2006年中国的进口关税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降,反映出中国政府构建开放型经济体与营造市场化经济环境的决心。当企业处于稳定有序的外部市场环境时,进行外部投资与出口的意愿逐渐提升,有利于出口的持续性与稳定性。

企业出口时需要克服高额的固定成本(Melitz,2003),即使是经营能力出色、抗风险能力强的企业也需要融资支持(Greenaway等,2007)。银行在审核出口企业的贷款申请时不仅考虑企业的资产实力和现金流状况,还需要考虑企业在出口时所面临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当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时,企业在出口过程中遭遇不公平待遇的可能性下降,

企业的违约风险下降。这一信号传递给贷款银行时,其贷款的意愿会提高,贷款利率相应下降。低成本的融资帮助企业克服出口固定成本,有助于提高出口持续时间。

大部分企业都是风险厌恶型的,只有少部分企业是风险爱好型的。如果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无法下降,出口企业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将日益增强,对外投资和出口的意愿持续下降(Daude和Stein,2007)。同时,高度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往往与政治环境不稳定、基础设施及法律制度不完善相联系(Blonigen,2005),这会威胁企业的经营安全和降低预期利润,促使企业做出中断或者终止出口的决策。稳定的贸易政策环境能够为出口企业提供安全稳定的经营空间,出口企业的正当权益能够得到有效保护,对企业形成激励效应,使具有稳健性偏好的企业有动力去克服出口过程中的固定成本和交易风险。在惯性效应的作用下,企业将持续开展出口业务,提升出口的持续时间。

中国加入WTO后,该组织的所有成员对中国均实行最惠国待遇,这一变化有利于中国企业获得出口的规模经济效应。张杰等(2009)认为出口是中国本土制造业企业实现规模经济的重要手段,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下降帮助中国企业巩固已有市场和开拓新的出口市场,进一步扩大了规模经济效应。中国企业从规模经济效益中获益,有能力和动机进行更多预期有利可图的投资活动,提升企业的风险承担能力。

如果面临持续的不确定性,企业在做进入和退出决定时最典型的特征是“迟滞现象”,即在不确定性环境下,即使促使企业做出最初决策的原因已经反转,企业也仍旧维持现状(Dixit,1989)。在加入WTO之前,中国经历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2000年以美元计的出口额比1978年增长了2730%,但企业所面临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并没有因为出口额的大幅增长而降低。这种不确定性的存在使企业对出口

收益的预测区间扩大,如果该区间有相当一部分为负,则出于规避风险的考虑,企业首先考虑推迟出口,以等待这种不确定性的下降。企业在避免“坏消息”与获得潜在出口收益之间权衡,所以等待具有一定的期权价值(Handley, 2014)。如果企业放弃这一期权价值,选择直接进入国际市场,将面临出口固定成本和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双重压力,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企业出口的高退出率和不稳定性(Nguyen, 2012; 叶宁华等, 2015)。

## 二、指标测度、数据说明与典型事实

本文以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作为研究对象。中国加入 WTO 后对美国出口大幅增长,参与企业众多,可获得大样本的微观数据。

测度出口稳定性的数据来源是 2000—2006 年中国海关进出口数据库,该数据库涵盖了每个月中国境内 41 个直属海关发生的进出口交易,统计了包括企业名称、产品种类、金额、数量、价格、国别(地区)等详细信息,产品以 HS8 分位编码。

用于计算关税降幅和关税水平的数据来自 WTO;用于计算出口额、出口经验和出口产品数的数据来自 2000—2006 年中国海关进出口数据库;显性比较优势数据来源于 CEPII;中间商出口比例数据来自 Ahn 等(2011)。

由于企业—产品在季度上的出口连续性远不如年度,需要处理的技术细节是如何定义企业—产品出口片段的进入和退出时间。对于进入时间遵循如下定义:从 2001 年第 1 季度至 2002 年第 4 季度,如果企业—产品在上述六个时间点中的任意一个有出口记录,且在该时间点之前连续三个季度以上无出口记录,则将该时间点作为出口片段的进入时间;如果同一企业—产品具有多个出口片段,则取其首个出口片段。

完成生存数据的构建后,样本总计含有 157782 个企业—产品出口片段。每一个进入时间点的出口片段中,只持续一个季度即退出的片段均超过 50%,即超过一半的出口行为只是一种尝试或实验,企业很快就放弃该产品的出口,这与现有研究关于出口稳定性较低的结论一致。

## 三、计量检验结果与解析

回归结果显示,贸易政策不确定性降幅对出口退出风险率的影响系数显著为负,说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有助于延缓企业—产品退出出口市场的时间,延长出口持续时间,提高出口稳定性。中国在入世之前已持续多年获得对美国出口的最惠国待遇,但这一待遇也持续面临被废除的风险。虽然废除这一决议在美国国会通过并最终执行的概率极

低,但一旦发生,将严重冲击两国之间的贸易。中国加入 WTO 使美国对中国的最惠国待遇长期维持下去,极大地降低了中国企业出口美国所面临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从而提升出口持续时间。关税水平的变化对退出风险率的影响显著为负,表明关税水平下降也有助于延长出口持续时间。关税的水平值对出口退出风险率的影响显著为正,表明关税水平越高,会加快企业—产品退出出口。

观察其他控制变量对出口退出风险率的影响,发现企业—产品的出口额、企业的出口经验、出口产品数、产品的显性比较优势和中间商出口比例对出口退出风险率的影响均显著为负,表明企业出口的产品金额越高、经验越丰富、出口产品数越多,以及产品的比较优势越明显、中间商出口比例越高,越有利于延缓企业—产品退出出口的时间,提高出口的稳定性。

WTO 在 2005 年完全废除了《多种纤维协议》(MFA),取消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纺织品歧视性的进口配额制度。这一政策变更发生在本文的样本期间,促使相关行业的出口行为出现较大的调整(Khandelwal 等, 2013)。为了控制纺织品配额制度的取消对本文基本结论的影响,我们按照 Bas 等(2015)的方法,剔除 HS2 分位大于 50 小于 63 的纺织品行业产品,估计结果表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幅度与关税变化对出口退出风险率的影响与上述结论仍然保持一致,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和关税水平的下降均有利于出口稳定性,而关税水平系数变得不显著。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对单一企业意味着出口环境的好转,将提高企业出口参与的积极性(Handley, 2014)。但对所有参与出口的企业来说,又可能带来“合成谬误”的结果,贸易壁垒的降低可能引致大量企业同时出口相同的产品,使原本看似是商机的市场变得无利可图。竞争的激烈化不仅导致资源在企业间的再分配,也导致企业内部出口产品组合的调整,企业可能放弃部分产品的出口,集中出口具有较强竞争力的产品,因此,基于市场竞争的再分配效应,贸易政策不确定下降对出口稳定的影响将出现分化。我们将企业进入当年出口额最高的三种产品定义为核心产品,以此创建虚拟变量,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降幅变量构成交互项,回归结果显示,当产品为核心产品时,贸易政策不确定性降幅边际影响显著为负;当产品为非核心产品时,贸易政策不确定性降幅边际影响显著为正。这表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对出口持续时间存在异质性影响:提高了核心产品的出口持续时间,改善其出口稳定性,而加速了非核心产品的退出。

■ 《世界经济》2019 年第 1 期,约 24000 字